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史

第五卷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张静如 总主编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文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史

第五卷



武国友 著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 第5卷/张静如总主编;武国友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ISBN 978-7-5436-5771-7

I. 中... II. ①张...②武... III. 中国-现代史-1949—2009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4039 号

书 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5卷)

总 主 编 张静如

著 者 武国友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李忠东 电话 (0532)85816241

特约编辑 陈 涛

封面设计 申 尧 程 皓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87mm×1092mm)

印 张 33.25

插 页 6

字 数 62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57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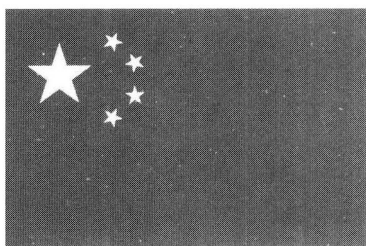
定价(精) 68.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谨以此书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编委会

主 任 宋贵伦 张文启

总主编 张静如

委 员(按姓氏笔画)

卢颖华 孙大力 许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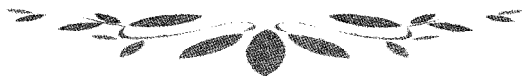
张 化 张文启 张树军

张静如 宋贵伦 辛国安

武国友 庞 松 柳建辉

郑 谦

目 录



第一章 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新阶段	[1]
第一节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新形势	[1]
第二节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及其划时代意义	[11]
第三节 新一轮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	[32]
第四节 中共十四大及其三大历史性决策	[39]
第五节 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	[52]
第六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纲领的制定和实施	[57]
第二章 启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	[63]
第一节 完善承包制和试行股份制	[63]
第二节 理顺价格和流通体制	[79]
第三节 加快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87]
第四节 推进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	[96]
第三章 治理经济软环境和改革财税金融体制	[111]
第一节 整顿和治理市场经济环境	[111]
第二节 按照市场取向建构新的财税体制	[126]
第三节 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	[133]
第四节 加强宏观调控 实现经济软着陆	[143]
第五节 制定和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51]
第四章 着眼于跨世纪的战略发展和长远发展	[158]
第一节 努力走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	[158]
第二节 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79]
第三节 进行西部大开发	[187]

第四节	制定和实施“九五”计划与2010年社会发展规划	[200]
第五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	[207]
第五章	加强国企改革攻坚和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发展	[221]
第一节	面向世纪末的路向抉择	[221]
第二节	中共十五大及其跨世纪发展的新部署	[228]
第三节	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改造	[244]
第四节	大刀阔斧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264]
第五节	坚持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加快民族地区建设步伐	[279]
第六章	努力化解体制机制新矛盾和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	[292]
第一节	采取积极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292]
第二节	扩大内需与再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311]
第三节	全面启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	[325]
第四节	加大对三农发展的政策支持	[336]
第五节	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364]
第七章	创新政治与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380]
第一节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380]
第二节	提出和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	[388]
第三节	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398]
第四节	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415]
第八章	科学治党治军和正确处理内外关系	[426]
第一节	推进军队和国防体制改革	[426]
第二节	拓展多边外交和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441]
第三节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	[465]
第四节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503]
第九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施“走出去”战略	[516]
第一节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艰难历程	[516]
第二节	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和挑战	[520]
第三节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524]

第一章 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新阶段



第一节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 改革开放面临的新形势

一 苏东剧变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世界原有的两极格局被打破,多极化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种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既是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在机遇的背后也充满着压力和挑战。怎样才能在新格局中实现民族的振兴,使本民族在这个多极世界里迅速发展?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面前的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

如果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大格局中作横向比较,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历史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或许,只有透过这个视角,人们才更能理解已经 88 岁高龄的老人邓小平的一片苦心。时代发展的机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左”的干扰,曾几度从我们身边溜走。

第一次机遇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时值世界性的科技革命的兴起。西德、日本抓住了这次机遇,因而使本国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则由于正在搞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正在大搞阶级斗争,错过了这次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这样,中国不仅被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拉下,而且进一步被发达国家甩得更远。

第二次机遇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时值发达国家搞技术的更新换代。对于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正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好机会,而这时中国却仍醉心于阶级斗争,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再次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相反,亚洲四小龙抓住了这次机遇,因而经济迅速腾飞,实现了现代化。

正因为错过了这两次机遇,所以中国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才迅

速拉大。

回眸历史,人们不难记起,新中国刚成立时,与日本相比,两国经济还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由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便落在了人家的后面。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曾喜欢与印度作比较,认为中国的经济水平优于对方。曾几何时,印度和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正在起飞,而中国曾经一度拥有的优越感也因机遇的丧失而耗尽。

更为冷酷的现实是:苏东国家由于未能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而最终解体。

从1989年6月波兰大选开始,东欧风云突变,到年底出现了雪崩式的“多米诺效应”: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民德、保、捷、匈4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权力基础遭到严重破坏;12月,罗马尼亚事件^①后,罗共已不复存在。半年之内形势变化如此之快、之大,为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们所始料不及。1990年上半年,东欧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又遭到了极大的削弱,经过大选或地方选举,绝大多数丧失了政权,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反对派占据了政治舞台。之后,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情况也急剧变化,共产主义政党相继失去政权,沦为在野党。1991年,苏联8.19事件^②后,苏联共产党受到沉重打击,政治上丧失政权,组织上陷于瘫痪,其活动也无法正常进行。就整个东欧国家来说,都发生了剧变。苏联解体分裂成15个国家,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即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即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

1991年12月25日,西方正在庆祝圣诞节之时,在克里姆林宫却发生了一个举世关注的大事件:飘扬了69个春秋的苏联国旗降落下来。这意味着苏联这个显赫一时的超级大国给自己的解体正式画上了句号。

昔日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顷刻之间在剧烈的事变中瓦解沉没了,既无坦克声,也无硝烟味,这是为什么?对此,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不能不焦灼地思索。毋庸讳言,对于这样一个广泛而又复杂的世界性问题,要给

^①1989年12月罗马尼亚政权更迭的事件:1989年12月19日,蒂米什瓦拉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首都布加勒斯特也发生两起爆炸事件。21日中午,罗当局在布加勒斯特共和国广场组织数万人的群众集会,以示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反对蒂米什瓦拉市骚乱。集会结束时发生反对齐奥塞斯库的群众示威游行和军人起义。22日,前罗共中央书记扬·伊利埃斯库宣布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成立并接管国家政权,同时公布10点施政纲领:取消一党制,实行多党制;1990年4月举行全国自由选举;实行三权分立,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名改为“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事件导致了罗马尼亚原有权体系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②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为首的8名高级领导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终止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在苏联实行“紧急状态”,试图阻止激进派上台和联盟解体。由于这一行动没有群众基础和组织不足,仅过3天就宣告失败,史称“8.19事件”。

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绝非易事,但有一点却使人们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不改革、不加快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报纸、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不断地报道苏东剧变后的状态:共产党权力被剥夺,共产党领导人纷纷落难,共产党财产被没收,原官员和秘密警察受迫害;经济呈滑坡趋势,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民族矛盾尖锐激化,民族冲突战火连天,国家解体……

当然,也有人从不同角度总结苏东剧变,认为:苏联的解体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直接结果;这些国家都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执政党,没有一个保持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央领导核心,在关键时刻,领导层的分歧导致了党的分裂,给反对派夺权提供了机会;党的主要领导人独断专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致使在重大政策上一再失误;当要求民主的浪潮袭来时,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错误地接受了政治多元化理论,使各种思潮纷纷出笼,反对派组织和政党林立,走多党制议会民主道路成为一股洪流,最终冲垮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内缺乏健全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主要是没有实际地体现全党对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监督机制。如此等等。诚然,上述因素对于苏东剧变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人们更应该看到:苏东剧变最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经济基础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没搞好,体制有问题,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心中失去了吸引力,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群众甚至是广大党员的强烈不满。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悲剧,典型地呈现出这样的冲突性社会状态。

就苏联的情况而言,它的经济体制从20世纪30年代建立之后直到解体,并未进行重大变革。其理论基础是产品经济论,即极端排斥市场调节,视商品经济为异己。其运行机制则依靠权力的指令来构建。经济结构是准军事型的超重结构。不可否认,苏联经济体制在其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起过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使苏联从沙俄时代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几十年当中跻身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列。从这方面讲,功不可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缺乏平衡和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缺乏创新力,阻碍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一旦权力和指令的结构发生震动,经济体制的运转便会发生震荡,导致原本已经功能衰退的经济体制失去生存能力。

经济失败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苏联经济体制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原有的功能逐渐衰退,致使效率低下,激励减弱,运行失灵。从苏联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些效率指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由1951—1955年间的11.4%下降为1966—1970年间的7.7%,

降低了1/3。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均实际增长率的情况是:社会总产值,1966—1970年为7.4%,1971—1975年为6.3%,1976—1980年为4.2%,1981—1985年为3.3%,到1990年为-2%;国民收入,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为5.7%,1976—1980年为4.3%,1981—1985年为3.2%,到1990年为4%。再从投资效益和基金产值率来看,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产出的国民收入,由1960年的72戈比降为1970年的54戈比,1980年又降至40戈比,到1984年只有38戈比。苏联的基金产值率在24年里几乎降低了一半。

这种体制僵硬、效益低下的结果,使得苏联的经济危机最终由慢性发展变成急性发作。所以,原体制的一切教义都走向其反面:从产品经济观滑到市场拜物教;从指令性经济走到无政府状态;从党包揽一切经济决策走到解散共产党。

在苏联的垮台问题上,军备竞赛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军备竞赛导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是军备竞赛导致经济结构的畸形。

苏联的经济实力大大逊于美国,但军费开支却稍高于美国。仅此一点,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的损害程度便可想而知。过去苏联发表的官方统计数字,显然夸大了苏联的经济实力。按苏联国家统计局的计算,1987年,苏联国民收入总额相当于美国的64%,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57%。但是,按《美国统计摘要》计算,1987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相当于美国的54.3%,人均GNP相当于美国的46.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87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9.67%,人均GNP为美国的34.66%。此外,其工业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9%。在这种状态下,苏联拼命地维持军事上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均势,其霸权地位的维持完全是拼性命的结果,因而不可能长久。1991年5月,俄罗斯共产党一位政治局委员曾透露:苏联40%的生产能力都用在了军事生产上。这种畸形经济结构非垮台不可。

再从体制设计思路的历史局限性来看,苏联的旧经济体制是传统工业化时期产品经济模式的设计产物。从理论上,它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这种构想主要表现在关于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的设想,作为体制设计的现实指导,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排斥商品和货币的。然而,回到现实中来,苏联当时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商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任务重、时间紧,用通常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商业轨道不能保证经济生活的运行。此外,就苏联工业化建设开始时的主导思想而言,是出于保卫苏维埃的政治考虑,而不是充分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尽管重工业大都亏损,但是斯大林誉之为资本主义经济无可比拟的“高级盈利”。这与产品经济理论恰好合拍,从而强化

了产品经济观。它不仅表现在流通和交换领域,而且渗入社会经济的深层结构。从限制市场和价值规律作用到否认经济利益差别,忽视物质利益原则,乃至高度集权、行政指令等,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无不体现产品经济的精神。

这种产品经济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到过特定的作用。但是,它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既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又不能合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经济利益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劳动者实际拥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及其产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产品经济扭曲了这些关系,因而缺乏生命力。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把这种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经济体制固定化、神圣化,不认为它需要不断地加以改革。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导致突变。从苏东剧变的经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得好:“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这种总结,可以说是对苏东剧变的深刻反思。

苏东剧变给中国提供了血的教训。同时,周边国家的迅速崛起已经对中国形成了压力和挑战。这是中国不得不直面以对的严峻现实。

二 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压力与挑战

打开世界经济发展级差图,人们就会从它的曲线变化中清楚地看到:中国周边那些曾被中国人认为是不太发达的昔日“蛮夷小邦”,如今已把中国抛在了后边。

20世纪80年代,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被称作“四小龙”的中国的台湾、香港和韩国、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发展,远远超过了中国。

中国台湾1952—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8.4%的速度增长,1988年以来年均增速为7.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52年为194美元,1991年达到8815美元;进出口“贸易”1950—1975年间只有3年为顺差,而1976年—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都是顺差,1991年外贸总额达到1391亿美元,高于大陆的1357亿美元;1985年仍有外债47.65亿美元,1988年以后已没有外债负担,而到1991年底外汇储备已达824亿美元。台湾经济的较快发展固然有着重要外因,但其不断进行调整的内因也不可忽视。

1949—1952年,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业有了较快发展。1953—1960年,台湾采取“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政策,鼓励和保护创办替代工业,使工业产值明显上升。1961—1973年,台湾由“进口替代”政策转向实行“出口导向”政策,重点发展纺织、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吸引外商投资,设立出口加工区,引进技术设备,大力开发新产品,积极鼓励出口,使工业产品出口大大增加。

1974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朝着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的经济方向发展,加上工资成本上升,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的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台湾出口面临一定困难。台湾对此转而采取分散出口政策,并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实现产业升级,保证经济持续发展。

香港1945—1950年主要恢复和发展转口贸易和有关服务业,194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418港元。1951—1960年,香港经济由转口贸易为主转向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其产品以外销为目的。1961—1970年,香港大力发展制造业。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香港工业向多元化、高质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进入国际化新阶段,成为区域性的金融、航运、贸易、旅游、信息中心。1992年,香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6000美元。

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了发展教育这一不同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60年代初,韩国又采取“出口主导型开发战略”,利用外国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发展出口加工业,同时对纺织、食品等工业进行投资建设。从70年代初开始,韩国实施发展重化工业方针,并大量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推行新技术产业化道路,加强对海外投资,保持了经济发展势头。1971—1991年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6%~11.3%之间。1989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

新加坡是一个陆地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幅员很小、地质情况复杂、自然资源贫乏、连淡水都要进口的岛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加坡却取得了世界公认的两个文明建设的显著成果。这是新加坡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政策的结果。新加坡于1959年独立后,实行开放型的经济政策,进出口货物基本免税,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不加干预,只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对外贸易,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并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进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完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更注重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高科技工业发展。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971—1980年为9%,1991年为7.7%。1989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0450美元。新加坡在取得令人瞩目经济奇迹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加坡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通过学校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经过长期努力,新加坡把小小的岛国建设成了具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美丽、清新、整洁、舒适的自然环境的国家,从而成了对世界各地游客极具吸引力的“花园国家”。

在中国周边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正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传递的有利时机,利用较之以往宽松得多的国际自由贸易环境,取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国家和地区。据日本

野村综合研究所的研究资料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6%,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7.5%。8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8%,东亚地区为8%。90年代按标准估算模式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8%,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7.7%。其中,亚洲四小龙为7.2%,东盟4国为6.2%,中国大陆为9.1%,增长率均比世界经济增长平均高5个百分点左右。^①由于经济增长较快,所以贸易中心开始向这一地区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亚太地区对外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外汇储备占到世界的1/3。1980年世界最大的20个出口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只有4个,1991年已达9个。美国1992年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值达到2190亿美元,约占美国出口总值的49%;在进口总值中,来自亚太地区的进口值为3130亿美元,约占美国进口总值的57%。面对亚太地区这种迅猛的发展势头,一些未来学家曾作出这样的估算:因地理、人口、经济环境和购买力等因素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地区。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按经济实力划分,大体上呈宝塔形:位于塔尖的是日本;第二层有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第三层是新加坡之外的东盟4国,即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第四层是南亚诸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和阿富汗;第五层就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3国。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既是刺激和挑战,同时也是示范和机缘。争雄经济霸主的日本与强势推进的亚洲四小龙都在经济发展中显示出咄咄逼人之势。中国台湾的《天下》杂志于1988年7月1日刊登了一篇分析1967—1986年20年来世界10个大国(美、日、苏、西德、法、意、英、中、加、巴西)在全球生产总额中所占地位变化的文章。文章指出:西方各大国除西德、意大利地位略有上升外,其余各国均已下降,其中美国衰退尤为严重,虽仍为第一强国,但比重却由占世界生产总额的33.8%降至26.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却从5.2%猛增为12.4%,由20年前的世界老三取代了苏联而成为今日世界经济亚军。亚洲四小龙虽未进入10强,但近20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却以平均近10%的速度增长,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中的佼佼者。其增长速度之快,不但远远超过美国、西欧,甚至连日本也望尘莫及。文章的结论是“国力竞赛,东升西落”。事实的确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西德奇迹,60年代崛起了日本,70年代亚洲四小龙实现腾飞。进入80年代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经济增长也让人刮目相看。一个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开始

^①《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全书》,第1卷,第24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同北美和欧洲共同体经济集团分庭抗礼。

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均GNP不足100美元,1988年已达21050美元,仅次于瑞士;60年代初开始经济起飞时,中国台湾、韩国人均GNP分别为100美元左右和83美元,1988年中国台湾已超过7000美元,韩国亦有3600多美元,香港地区、新加坡已达8000多美元,这四小龙的经济水平超过欧洲的西班牙、希腊、爱尔兰。

1988年,日本年出口额达2647亿美元;面积和人口都只与中国浙江省差不多的韩国年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大大超过中国年出口总额;面积比海南岛大不了许多的中国台湾年出口额也在600亿美元以上。东亚地区出口的商品已远非50年代的初级农矿产品、60—70年代的轻纺工业品,它的产品构成、市场分布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产品早已充斥美国市场,令“山姆大叔”徒唤奈何。韩国也已向另一超级经济强国——德国市场发起了挑战。

当世界首富美国正日趋蜕变为世界最大债务国时,日本却成了最大资本输出国。当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工业国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息不定的时候,中国台湾却有800亿美元的盈余正愁找不到出路,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日本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韩国虽债台高筑,但由于其年出口额增长快、外汇收入高,因而没有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债务危机。

经济发展伴随着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的转换。东亚不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直至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然而,现在东亚地区早已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换。从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各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来看,日本现在已是服务主导型的后工业经济。中国台湾、韩国则早已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香港地区、新加坡基本上没有农业,乃城邦经济,也从以前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过渡到以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亚地区只有东京算得上国际大都会。香港、新加坡、台北、汉城尚名不见经传,而今均已跻身于国际金融、贸易、信息、运输、商品集散中心之列。

如今,东亚地区经济正欲更上一层楼,日本雄心勃勃欲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989年美国取消了以往给亚洲四小龙贸易普惠制待遇。这意味着亚洲四小龙已从新兴工业化经济行列中毕业,向成熟型的工业化经济迈进。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则有望在20世纪90年代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

面对世界经济中心悄悄东移的态势,国际上许多人士纷纷预言:21世纪亚太地区将取代北大西洋两岸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马

克思 1848 年曾赞叹:18、19 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使欧洲资产阶级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半个世纪内,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地区获得的经济成就及速度又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工业革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正在崛起的“亚洲第五条龙”泰国,以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种特色,正在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瞩目。泰国从 1961 年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起,到 1985 年的 25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7.0% (按 1972 年的固定价格计算),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60 年的 100 美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900 美元,1988 年超过 1000 美元。按世界银行 1980 年规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410 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泰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同一时期,泰国制造业产值增长率达 10.7%,增长了 8 倍,工厂数从 1960 年的 14244 家增加到 1985 年的 90000 多家,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 1960 年的 12% 提高到 1985 年的 21% 以上,1981 年制造业部门的工人达 150 万人。按联合国的标准,泰国已经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实现了“半工业化”(制造业的比重超过 20%)。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连续几年的衰退,给不少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困难,而作为开放性经济的泰国,由于它在国际上的贸易极为广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商品价格下跌的较大冲击。但是,这几年泰国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充分表现了泰国经济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马来西亚也已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据大众银行的分析结论,马来西亚已跻身于德国、日本、韩国和泰国等国的行列,取得可观的经济增长,并朝全球竞争的最前线推进。马来西亚很有潜力超越其邻国泰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以蓬勃的经济作后盾,稳定的政治为前提,在丰富的天然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的支持下,马来西亚在 2030 年成为工业先进国家的目标可望实现。

面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发展,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来说,无疑既是压力又是挑战。

三 面对全球发展态势的冷静思考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是全球经济大发展的一个缩影。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大发展并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的,而是在国际化日益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态势下,一些地理邻近、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更容易发生广泛的经济联系,

形成利害与共、一致对外的经济集团,即区域性的经济集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国经济集团的建立,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新特点。无论是工业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过跨国经济集团。只不过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这种集团化趋势更为明显罢了。

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20世纪80年代,欧共体成员国增加到12个,1985年又决定在1992年底以前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其“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自由流动”。1991年10月,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就建成欧洲经济贸易区达成协议。根据1991年底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签署的《马斯特里赫条约》,即《关于建立欧洲联盟条约》的规定,在20世纪末将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发行单一货币,加速向完全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推进。

在北美,1988年美国与加拿大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10年内两国完全取消关税,加强投资和劳务合作。1990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又宣布了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新政策,即以自由贸易、改善拉美投资条件和减轻拉美债务为基础,建立起新的“伙伴关系”。这标志着由过去以美援为基础、以美国为盟主的泛美政治同盟将转变为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美国占主导的泛美经济联盟。

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区内各国(含地区)的相互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迅速增长;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转移过程中已经形成一种动态的和多层次的劳动分工;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始出现某些水平分工形式,而且有水平分工比重逐渐扩大、垂直分工相对缩小的趋势。1987年底,日本以通产省、外务省、经济企划厅和首相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为核心,正式提出了“东亚经济圈”的构想。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了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与会12国都派了外交部长和经济贸易部长参加会议,这标志着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官方协调因素在增加。专家预计,一个以日本和东亚国家为中心的亚太经济圈将有可能形成区域性经济群体。经济集团化,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和国际竞争激烈的产物。在这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处境更加困难。

应该看到:挑战与机遇同在,风险与利益并存。在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面前,中国唯有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把握历史契机,自强自立,走向世界。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尤其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必须依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和斗争的形势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发展生产力也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基本、最有说服